

《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其不同的版本

任 金 城

地图集的出现是地图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一定时期地图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我国是绘制地图和应用地图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经广泛地应用到军事、政治、经济、建筑等各个方面。秦汉以来，随着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形成，历代统治阶级都很重视全国地图的绘制，并以规模庞大著称于世。例如，晋以前的“《旧天下大图》用缣八十疋”^①，晋裴秀的《地形方丈图》、唐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元朱思本的《舆地图》等，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全国大型地图。虽然它们都曾经在当时起过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过于庞大，不易保存，都没有能流传下来。到了明代，罗洪先根据朱思本的《舆地图》缩小分幅并加以增广而成《广舆图》，采用了书本的形式，不仅使朱图免遭埋没，而且还吸收元明以来各种类型地图的精华，创造性地编制成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由于它适应了当时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需要，因此能在我国得到广泛的流传，影响极为深远，在我国地图学史上堪称为承前启后之佳作。现对《广舆图》的学术价值及版本源流作概要论述。

一、《广舆图》的学术价值

(一) 《广舆图》保存了元代朱思本《舆地图》的精华，继

承发展了计里画方的传统制图方法。

《輿地图》是朱思本“周游天下，考覆地理，竭十年之力”而成的一幅七尺见方的全国大地图^②。他在编绘地图之先，曾“登会稽，泛洞庭，纵游荆襄，流览淮泗，历韩魏齐鲁之郊，结轶燕赵……”进行实地考察，经过一番“讯遗黎，寻故迹，考郡邑之因革，覆河山之名实”的调查研究，并参阅了“魏郦道元注《水经》，唐《通典》、《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今秘府《大一统志》”等典籍，费了一番“参考古今，量校远近”的功夫。并且利用“中朝士夫，使于四方”的机会，“嘱以质诸藩府，博采群言，随地为图”，最后“乃合而为一”。所以他的地图精度较高，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其间河山绣错，城连径属，旁通正出，布置曲折，靡不精到”。^③遗憾的是，这一元代重要地图，未能得到广泛流传，到明嘉靖年间，已经非常罕见了。所以罗洪先在他的《广輿图序》中说：“访求三年，偶得朱思本图……”，又说“……其所为画方之法，则巧思者不逮也。然考郡史，不载姓名，其图亦不多见，岂所谓本之则无矣乎？呜呼！又安知吾之诸图之不为长物也。”^④而罗洪先也考虑到地图不易流传，所以他把长广七尺的《輿地图》，用画方的方法改编成分省地图集的形式，并“悉所见闻，增其未备，因广其图至于数十”，故称之为《广輿图》。由于《广輿图》的出现和流传，使朱图得以间接流传至今，为我国保存了元代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珍贵地图资料。

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在我国有着极悠久的历史，但是运用这一方法的制图学家及其地图作品并不多见，到了明初已很少运用。例如《大明一统志》及《皇明輿图》^⑤中的地图，虽然刻印技术非常精细，但地图的内容却极粗略，没有运用画方。其他如正德年间杨子器绘的《輿地图》^⑥和嘉靖三十四年重刻的喻时《古今形胜之图》^⑦等也都没有画方。至于明初地方志中的地图，更

罕见有画方者。因此各图的精度也不可能很高，所以罗洪先在他的序言中说：“……尝遍观天下图籍，虽极详尽，其疏密失准，远近错误，百篇而一，莫之能易也。”又说：“访求三年，偶得元人朱思本图，其图有计里画方之法，而形实自是可据，从而分合，东西相侔，不至背舛”^⑧。所以罗洪先在改编朱图的同时也把画方之法继承下来，并加以完善和发展。《广舆图》中的“輿地总图”和各分省图都采用了严格的计里画方，总图每方五百里，分省图每方百里。“九边图”和各种专题地图，是由罗洪先增入的，也根据图幅和地区范围的大小分别采用每方四十里、一百里、二百里、四百里和五百里等不同的比例尺，从而保证了各图都有一定的数学基础，使地图的精度达到较高的水平。以輿地总图为例，东南沿海海岸和黄河长江水系的走向同现在的地图相比相差无几。在分省图中，各省图的轮廓也和现代地图非常接近。从传世的所有刻本地图来看，《广舆图》可算是最早最好的一部。由于《广舆图》的继承和发展，使濒临绝迹的古老的计里画方制图方法又恢复了它的青春。明清之际计里画方地图的大量出现，可以说多源于《广舆图》。

（二）《广舆图》制定了一套以几何符号为主的图例符号和图例，把我国制图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罗洪先在他的序文附记最后部分提出“山川城邑，名状交错，书不尽言，易以省文二十有四……”^⑨，并绘出了二十四个符号的标准画法。这里所说的“省文”即含有用符号代替文字的意思，而最后绘出的标准符号即是图例。

在地图中应用符号来表示各种地理要素的方法，在我国早已有之。如长沙马王堆古汉墓出土的《地形图》和《驻军图》中就绘出一些简单的符号，宋代黄裳的《地理图》也绘有长城、森林和山形等象形符号，但是都没有标出图例。著名的西安碑林石刻《禹迹图》图首虽然也有三行带有图例性质的说明文字^⑩，但是

并没有刻出符号，所以还不能算是完整的图例。到了明代，一些地图中先后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符号，并出现了由杂乱繁琐向简明扼要和规范化方向发展的趋势。在表示方法上则逐步由真形图画向象形符号和几何符号方向转化，符号的数量也在不断加多。但是象《广輿图》这样系统地提出二十四个规范化的几何符号这还是第一次。关于图例，在明代个别地图中也出现过带有图例性的说明文字（如明正德年间杨子器的地图^⑩）。但是，象《广輿图》这样既简明又规范地把图例标绘在全图之首的做法，在以往的地图中则尚未发现。

一般说来，用简明的符号代替写实图画是区别地图和山水画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地图符号的演进也是由繁杂到简明；由不规则到规范化；由象形图画到几何符号的过程。符号的内容和数量也是由零星的少数几个向比较完整的系列化的方向发展。如果按照以上的发展过程来看，《广輿图》的二十四个图例符号无论在表现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仅代表不同职能居民点的符号就有府、州、县、驿、卫、所、屯、堡、城、营、站、关、寨、宣慰司、宣抚、安抚、长官等十七个之多，这在以往的地图中是不多见的。当然罗洪先的这种图例在朱思本的地图中是否已经存在？因朱图早已失传尚不能完全肯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象《广輿图》这样，在整个图集的四十多幅地图中，都严格地采用统一的标准图例的做法则是罗洪先的首创无疑。这些标准图例符号的出现，摆脱了以往地图上出现大量文字和象形图画的被动局面，保证了图面的清晰程度和单位面积上地理要素载负量的增加，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制图技术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三）《广輿图》保存了元明以来一些失传的重要地图。

《广輿图》除保存了朱思本地图外，还保存了一些其他地图。其中最重要的有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濬的《混一疆理图》。关于李泽民和清濬的事迹，中国文献记载很少，只知道

李泽民与朱思本为同时期人。清濬为元末明初人，曾任应天府灵古寺主持^⑫。从朝鲜权近的一篇跋文中得知“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濬《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元年（1399）明惠帝登极时，朝鲜贺使金士衡，将这两幅图带往朝鲜。至建文四年由金士衡和李茂进行研究，命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又由权近增加了朝鲜图和日本图，合成新图，名《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⑬

李泽民和清濬的图早已失传，只能从朝鲜李荟和权近改编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中略见其概要。（该图原图也早失传，现存的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本是1500年的摹绘本。^⑭）其实罗洪先在编绘《广舆图》时，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还见流传，罗洪先也曾直接参考过李图^⑮，以《广舆图》的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与权近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对照，可以看出两图的轮廓基本相似，只是地名有些出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南海夷图中已经绘出了三角形的非洲大陆，这反映出十四世纪初李泽民的图中已经知道有非洲大陆存在，并且正确地绘成尖端朝南的三角形，而当时欧洲和阿拉伯地图都把非洲的尖端指向东方^⑯。不过福克斯把这一突出的成绩归功于朱思本的《舆地图》，这显然是错误的。据朱思本自序所说：“至若涨海之东南，沙漠之西北，诸蕃异域，虽朝贡时至，而辽绝罕稽，言之者即不能详，详者又未必可信，故于斯类，姑用阙如。……”^⑰可见朱思本图主要绘的是中国内地，而不包括“诸蕃异域”部分。因此可以证明《广舆图》的这些域外部分，至少是“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和“西域图”等几幅边外地图，很可能直接间接地参考了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和清濬的《混一疆理图》。这两幅地图早已失传，过去只靠权近改绘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得以推测其大概情况，而且是被日本小川涿治介绍以后才为世人所注意。其实在《广舆图》中早已保存了这两图的

主要内容，而且《广輿图》的文字注记比权近图的文字更接近原图。^⑬

此外，《广輿图》关于边疆部分参考过的地图，据《念庵罗先生文集》卷十记载尚有《大明一统图志》、元朱思本、李泽民《輿地图》、许西峪的《九边小图》、吴云泉的《九边志》、先大夫的《辽东、蓟州图》、浦东牟钱维阳的《西关二图》、李侍御的《宣府图志》、京本《云中图》、新本《宣大图》、唐荆川的《大同三关图》、唐渔石的《三边四镇图》、杨虞坡徐斌的《水图》等凡一十四种。这里的十四种图志，除许西峪（许论）的《九边小图》（可能即许论《九边图论》中的附图）有单行本外，其余多不见流传。《广輿图》中的十一幅九边图和五幅边地图，可能都参考了这些地图，并把它们的精华部分保留在图内。

其他如黄河图、漕运图、海运图等专题地图，究竟参考吸收了哪些地图，尚需进一步探讨。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明代我国各种专题地图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并由罗洪先增加了画方，流传至今。

以往论述《广輿图》多强调了它保存朱思本图的方面，现在看来，它保存了元明以来其他重要地图的功绩也是不可忽视的。

（四）《广輿图》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集中反映了元明以来我国地图学发展的水平。

元明两代是我国传统地图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全国总图除了在朱思本图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外，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和航运、水利等事业发展的需要，还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专题地图。罗洪先《广輿图》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它能组合各方面、各种类型地图于同一图集之中，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统一体——综合地图集。这是地图学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根据罗洪先《广輿图》序中所列地图内容来看，可基本上归纳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政区图，包括“輿地总图一”和“两直

隶十三布政司图十六”。这是朱思本图的基本部分，也是整个图集的基础。他把不便卷舒的一幅大图根据画方的方法改编成一幅总图和十六幅分省图（其中陕西图分为两幅），使用起来非常方便。这种以行政区划分幅的基本体系，至今一直为中外地图集所广泛采用。

第二部分是边防图。包括“九边图十一”和“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诸边图五。”有明一代对北方边防极为重视，因此关于边防的地图也大量出现，成为明代地图发展上的一大特色。罗洪先以许论的《九边图论》为主，参考其他文献，并根据画方方法，利用统一的图例符号加以改编，制成九边总图和九边分图共十一幅（其中蓟州边图分为两幅）。同时明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也非常关切，故作诸边图五幅。这两组边防图的编选适应了当时政治军事的需要，也是明代边防地图成果的集中反映。明代后期的地图和地志著作，都要包括边防图和边防部分，这几乎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这一点也多受《广舆图》的影响。

第三部分是专题地图，包括有黄河图三，漕河图三，海运图二。这一组地图的篇幅虽然不多，但是它却反映了明代对黄河水利、漕运和海运事业的重视，及其在专题地图制作方面的成就，代表了地图发展的新方向。

第四部分为邻国和周边地区图。包括有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及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日本、琉球、四夷总图等^①。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对世界的认识程度。

另外，罗洪先序文附记中还提到“凡沿革附丽，统驭互更，难以旁缀者各为副图六十八”。关于这些“副图”曾引起一些人的猜测，认为“或许罗氏画了，却没有刊行。”（见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67页）其实这里所说的“副图”指的并不是地图，而是指沿革政区变迁等内容的说明文字和图表。这些文字和图表

分别附在各图之后，成为图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有图有说有表的组织形式，既继承了我国地志一类著作的传统，又为以后我国地图集发展提供了一个图文并茂的好范例。（这主要指《广舆图》的初刻本而言。在初刻本中，文字部分还是以图表的形式为主，说明性的文字也非常简练。可惜以后的翻刻本则增加了很多说明文字，走上图志发展的老路）

从以上全图集内容来看，可以说《广舆图》既有全国总图又有地方分图；既有政治军事形势又有自然经济的内容；既包括国内，又包括国外；既有地图，又有统计图表和说明文字，实在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综合地图集。这种编图体系，今天看来也是值得称赞的。在十六世纪中叶，能够创造性地编制出这样一部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高水平的综合性地图集，不仅在我国是空前的，而且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无怪乎西方学者柯恒儒(Klaproth)把它说成是“我所知道的在托勒密之后的最佳地理著作之一”。（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地学第一分册第152页）

二、《广舆图》的不同版本

《广舆图》由于内容丰富，适应了当时政治形势的需要，所以受到了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并对它进行不断地补充翻刻，使之得到广泛的流传。据目前所知，仅正式刻印的不同版本就有七八个之多。由于各种版本包括的内容和刻印的水平有很大的出入，因此弄清版本的源流及其特点是非常必要的。

由于罗洪先在广舆图序中没有具体说明成图的时间和作序的年月，所以关于该图初刻的时间一直没有定论。王庸先生在《中国地图史纲》中认为“此图最先在明嘉靖四十年（1561）由胡松刊行；”可能主要是根据嘉靖四十五年韩君恩关于“念庵罗先生考订增定从而广之，家藏未传，冢宰我柏泉胡夫子刊补著论，始传于浙。……”^②的记载。但是这一观点与下列事实是有明显

矛盾的：第一，在嘉靖四十年的胡松刻本中已经增加了日本和琉球两图，而初刻本中尚未有日本和琉球图，可见初刻本必然早于嘉靖四十年。第二，据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卷七载《广舆图》尚有一个“嘉靖戊午（1558）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重刊本”，既然是重刊本，则其初刊必然要早于1558年。第三，在张天复《皇舆考》一书的序言中已提到“…文襄桂公《舆地图志》……念庵罗公《广舆图》……司马许公《九边论》……”而张天复作序的时间是嘉靖三十六年（1557），从而可以进一步判断《广舆图》此前已经正式刻印出版，并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

如果再从地图的本身来看，在图中文字部分出现年号的地方有多处，其中出现最早的年号有洪武，最晚的年号为“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② 据此可知其初刻时间不会早于嘉靖三十二年。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判断其初刻时间当在1553年—1557年之间。为了方便起见，说它的初刻时间在1555年前后是不会有太大出入的。

现将已知各种版本的大致情况分述如下：

（一）约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前后的初刻本

这一版本已经极为罕见，据目前所知，只在北京图书馆和辽宁省博物馆各收藏一部。北京图书馆藏本《广舆图》是一部大幅整版图册，内容包括各种地图40种，48页，加上文字表格68页，共计117页，仅第一页序文缺失。与1561年胡松刻本比较，则尚未增加日本、琉球两图，而在最后第117页末尾也没有“嘉靖戊午十三道监察御史重刻”字样，可见它必然是重刻以前的刻本无疑。再从图的本身来看，全图集都采用严格的计里画方和标准的图例符号，再加上刻工的精雕细刻，所以整个图幅都非常精致美观，清晰而准确。以舆地总图为例，全国纵横为33×34厘米，共划为纵18格，横19格，总计为342方格，每格为18毫米见方，每方代表500里，折合比例约为1:1550万。图中地理轮廓和水系、

城邑的位置比较正确，在总图中没有标出长城，黄河源绘出三个湖泊（可能代表二巨泽和星宿海），这些都可能反映了元代朱思本地图的本来面目，是难能可贵的地图珍品。

经与罗洪先原序中所列内容比较，此初刻本较原序多出了“东南海夷图”和“西南海夷图”，并把原“朔漠图”扩大成二页。这可能由于在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倭寇和西北的俺答为患，为了适应这一政治形势的需要，根据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和清濬的《混一疆理图》的内容增加了这两幅地图。至于这个初刻本的主持人和“东南海夷图”、“西南海夷图”的编绘者究竟是罗洪先本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目前尚无法做结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这个初刻者和两幅海夷图的编绘者一定是非常忠于罗洪先的编图原则的人，很可能是他的助手或挚友。

辽宁省博物馆藏本《广舆图》就是福克斯所说罗振玉在旅顺所藏的那一部^②，福克斯并对它进行过详细的考证。遗憾的是有人把Port Arthur（旅顺）音译成“阿瑟港”并把它划到了加拿大境内^③，这是非常错误的。经核对，辽博藏本和北图藏本完全相同，只是装订形式不同（辽博本为散装，分成四夹，第二夹48—61页残佚，北图本合订为一大本），值得提出的是在辽博藏本中保存了一页朱思本的《舆图旧序》和罗洪先的原序，补充了北图藏本之缺。

（二）嘉靖三十七年（1558）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重刊本。

这一版本只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见到有一标籤为《明刻九边图》的残图。该图自61页“九边总图”起，包括九边分图、诸边图、黄河、漕运、海运以及朝鲜、朔漠、安南、……等图，最后终于117页，实际上就是《广舆图》的后半部。经与北图初刻本对照内容页码与刻印的形式完全相同，仅刻迹略显粗糙，在117页最后刻有“嘉靖戊午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重刊”字样。除档案馆藏本外，据福克斯和王重民先生提供，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也藏有

这一版本^④。

此外在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还藏有一手绘本《广舆图》，内容与前两版本很相近似，绘制也极精细，但它在舆地总图中却没有绘出海南岛，是其缺点。^⑤

（三）嘉靖四十年（1561）胡松刻本

河南省图书馆藏有这一版本，其特点是较以前增加了日本和琉球两图，并在各图空白处增加了一段上百字的评论性文字，实是画蛇添足。而所增的日本、琉球两图既没有画方，也没有用统一的图例符号，制图风格与全图极不协调。但总的看来全图刻印仍然比较精细，因此图面仍能保持疏朗、清晰、准确，不失为一难得优良版本。

（四）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季源刻本

此本以往文献未见著录，目前仅知在浙江省图书馆藏有此版。卷首有“嘉靖甲子（1564）春崇安后学止山丘云霄僭序”。据序文称：“季源吴公早抱经术，拜建州节，……暇展图而阅之，叹曰：‘扃户洞四方，垂棠而熙庶绩，无待于外求矣。’遂绣梓用广忠告。……”可见吴季源是一个地方官吏，他深知地图对治国安邦的重大作用，因而对《广舆图》进行翻刻。但是他终究是一个地方小官，不如十三道监察御史和做为浙江布政使的胡松实力雄厚，所以他的刻本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远不如前者。其最大的缺点是把舆地总图的画方任意减少 $\frac{3}{4}$ 。结果使每个方格比原图增大四倍。而在图角说明中仍是“每方五百里”。这显然对计里画方毫无所知。因为这一版本流行不广，所以影响也不大。

（五）嘉靖四十五年（1566）韩君恩刻本

这一版的最大特点就是图的开本比前几版缩小，每页高24.5厘米，宽17厘米，因此每幅地图不得不分由两个半版组成。这样每幅地图合起来仍然接近正方形（24.5×24厘米）。从图数和内容看与胡松刻本基本一致，只是在文字说明上则“……增桂见山

先生进宸图叙十六首，许默斋先生边论九首……”^②即增加了桂萼的《輿图记叙》和许论的《九边图论》，并把全书分二卷：卷一共97页，卷二共105页。据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本来看，此版开本虽然有所缩小，地图又分为两个半版，但是在刻印技术和制图水平方面仍保留嘉靖刻本的特色，地图画方仍保持正方形。但是，其中“漕运图”则出现了长方形的网格，为以后万历本的大倒退开了一个不良的先例。

（六）隆庆六年（1572）遂初书房重刊本

据邵懿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卷七载，《广輿图》还有一个明隆庆壬申建安杨氏遂初书房重刊本。因笔者未见到原书，全国善本书总目也未见著录，具体情况不详。

（七）万历七年（1579）钱岱刻本

此版仍分为两卷，开本比1566年版略大，但仍然比1561年以前各版小了一些，并在绘图水平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为了迁就版面，地图的画方都变成了 15×19 毫米的长方形，使罗洪先的原图出现了明显的变形，如在輿地总图中东西的长度明显加长，在朝鲜图中半岛的宽度比原图增长了 $1/5$ 以上，使图形轮廓明显失真。以往各版总图都没有长城，在这一版里增加了长城，但在前面的图例中却没有标出。图中黄河源绘成一个葫芦形，为以后明代地图在黄河源的画法上开创了一个错误的先例。地图的总数和内容与韩君恩刻本基本相同，只是地名注记和说明文字略有增改。如在北直隶图中“隆庆”已因穆宗改元而更名为“延庆”，朝鲜图后的说明文字由初刻本之一百六十余字增加到三百多字。府州县数目也与1566年版有所增减。这就是钱岱在《重刻广輿图叙》中所说的“……眡旧本（指1566年本）稍加展拓，增建而未入者入之，图说有未详者详之。……”可见他主要是在文字注记上下功夫，而对地图绘制技术则有所忽略。

（八）清嘉庆四年（1799）章学濂刊本

这次刻印只是照万历本翻刻，所以内容与万历本完全相同。正因为如此，有的书商便将章学濂的序撕掉，冒充“万历”刻本。但是仔细注意也不难看出，此版中把“万曆”年号因避乾隆（弘历）帝讳都印成“万历”，这是鉴别真伪的一个重要标志。总之这一版本虽然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它在《广輿图》的传播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目前所见的《广輿图》大多属于这一版本。

由于《广輿图》经过多次刻印，从而得到广泛的流传，影响极为深远，在我国地图发展史上实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元明以来的很多优秀地图，靠《广輿图》得到流传，明嘉靖以后直到清初的一些地图，又多数受到《广輿图》的影响。如万历年间汪作舟的《广輿考》几乎和《广輿图》完全相似（据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刊本所见，不但编次与图的形式相似，即九边图中所列建置表格，亦几乎完全相同）。崇祯年间陈组绶的《皇明职方地图》也只是根据《广輿图》的体例，略加增改。^②其他地图作品如吴学俨等人的《地图综要》、潘光祖的《輿图备考》等都显然是以《广輿图》为蓝本，仅大量增加了文字说明部分而已。直到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輿记要》中的附图，也还是以《广輿图》为基础。《广輿图》不仅在国内受到高度的重视，而且在国际上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由卫匡国神父（Martin Martini）在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地图集》（Atlas Sinensis）就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广輿图》为蓝本的。而著名的荷兰《布拉厄大地图集》（Johan Blaeu Le Grand Atlas）中的亚洲部分，又是根据卫匡国的《中国地图集》而绘制的。所以不少欧洲地理学家对《广輿图》都极为称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第237页），甚至可以说一直到十七世纪末叶，清康熙《皇輿全览图》传入西方以前，欧洲人所绘地图中的中国部分都是以罗洪先的《广輿图》为依据，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附表：《广舆图》八种版本比较表

制版年	制版人	卷数	地图种数	地图页数	总页数	图廓	特点	收藏单位
1555±	不明	不分卷	40	48	117	约33×34	刻印精美,画方正确、总图无长城,无日本、琉球二图。	北京图书馆、辽宁博物馆
1558	十三道监察御史	不分卷	40	48	117	约33×34	末页有“嘉靖戊午南京十三道监察御史重刻”。	第一历史档案馆、美国国会图书馆
1561	胡松	不分卷	43	51	121	约35.5×35	增加日本、琉球二图,各图增加评论文字。	河南省图书馆、
1564	吴季源	不分卷	40	48	117	34.5×33.5	舆地总图画方数减少 $\frac{3}{4}$ 。比例严重失误。	浙江省图书馆
1566	韩君恩	二卷	43	51	上卷97 下卷105	24.5×24	地图缩小,改成两个半版,文字增图叙和九边论。	历史博物馆、南京图书馆等
1572	遂初书房	二卷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1579	钱岱	二卷	43	51	上卷93 下卷108	27.5×38	图改为两个半版,画方成长方形,总图中增加长城、黄河源改成葫芦形,“隆庆”更名“延庆”。	北图、首都、故宫、上海、河南等馆。
1799	章学廉	二卷	43	51	上卷93 下卷106	27.5×38	同1579年本最后缺北夷、东北夷表格2页。	各大图书馆

注:

①转引自王庸《中国地图史纲》第21页。

②《铁琴铜剑楼书目》卷二十二,《贞一斋杂著》条。

③⑦朱思本《舆地图序》。

④⑧罗洪先《广舆图序》。

⑤关于此图的名称,各书著录有很大不同,《明史·艺文志》称“明舆指掌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存目称“舆图记叙”,《千顷堂书目》称“大明一统舆地指掌图”,在《修攘通考》中,该图卷首所刊奏稿中称“大明一统舆图”,而在奏稿以下目录及各页版口又均称“皇明舆图”。

⑥⑪原图藏旅顺博物馆。北京图书馆藏有该图的摹绘本。

⑦原图藏西班牙赛维利亚市的印度总档案馆。

⑨罗洪先《广舆图序》附记。

⑩在《禹迹图》图名左有三行文字说明:“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带有“图例”的性质,但是没有刻出其所指的标准符号,尚不能算作完整的“图例”。

⑫见《增集续传灯录》卷五。

⑬据权近在《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跋文:“天下至广也,内自中国,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至详难矣。故为图者,率皆疏略,唯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濬《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士衡),右丞丹阳李公(茂)燮理之暇,参研是图,命检详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疆域,泽民之图,亦多阙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是年秋八月阳村权近志。”载《韩国古地图》第188页。韩国图书馆学研究会1977年出版。

⑭见《日本古地图大成·世界图编》

⑮罗洪先《跋九边图》:“……日闻边警,但览图而悲,思见其人无由也。某大夫遣画史,从余书图,冀其所语此者,因取《大明一统图

志》、元朱思本、李泽民《輿地图》、许西峪《九边小图》、吴云泉《九边志》、先大夫《辽东、蓟州图》、浦东牟钱维阳《西关二图》、李侍御《宣府图志》、京本《云中图》、新本《宣大图》、唐荆川《大同三关图》、唐渔石《三边四镇图》、杨虞坡徐斌《水图》凡一十四种。量远近，分险夷，证古今，补遗误，将以归之，盖再浹旬而就。然非饱食无所用心者矣。……”载《念庵罗先生文集》卷十。

⑩②见Walter Fuchs: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U—TU 1946年北京辅仁大学出版。

⑪见青山定雄《元代の地图しニつしノて》，《东方学报》东京第八期，1938年第103—152页。

⑫最后这五幅地图在罗洪先的自序中没有提及。但是在嘉靖初刻本中已经包括了东南海夷图和西南海夷图，在嘉靖四十年胡松刻本中又增加了日本琉球两图。

⑬⑭见韩君恩《刻广輿图叙》，载《广輿图》卷首。

⑮在《广輿图》的“陕西輿图三”第20行末的文字说明中有“……以上系嘉靖三十二年十一月内数……”字样。

⑯见高儒《明清两代全国和省区地图集编制概况》，载《测绘学报》5卷4期，1962年。

⑰见注⑩该书第17页及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第186页。

⑱青山定雄《古地志地图等の調査》及附图。载《东方学报》东京第五册续编。第153—156页。

⑲据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大序：“……作天下大一统图二；作两直十三布政司图十五；作新旧九边图、七政图十有五；作山川图四；作漕河海运图二，海防图一；作太仆统辖图一，而亦尾以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岛夷图终焉。”可见其完全仿照《广輿图》的体例。

作者原工作单位：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广舆图》书影（见118页）